

这对于他们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后来云南吴佩衡、上海祝味菊都以善用大剂附子而名世。在四川的学医经历,受到川蜀名医重阳、温阳和善用大剂姜附的熏陶,应该是祝氏重阳、温阳思想的一个近因了。

### 3 力矫寒凉之弊,批判叶吴温病学说

明清时期,温病学说逐渐成熟,理论体系不断完善,逐渐形成了一个善用寒凉的新的学术流派——温病学派。温病学说的发源地和盛行地就是东南沿海的江浙沪地区。时至近代,江浙沪一带医家更是奉叶天士为宗师,以叶、薛、吴、王之著作作为准绳,多谓“南方无真伤寒,有之,皆温病也”。

叶氏主张“在表初用辛凉,到气才可清气,入营犹可透热转气,入血就恐耗血动血,直需凉血散血。”<sup>[4]</sup>其处方虽有前后缓急之法,而赏用清凉为其一贯的主张。所以叶氏有“虽在吴人阳微之体,亦当应用清凉”之说<sup>[4]</sup>。明知阳微过清必死,又曰“法应清凉,到十分之六七,即不可过于寒凉,恐成功反弃”<sup>[4]</sup>。叶氏学说一出,风靡大江南北,一时间医者案头皆备一册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以为圭臬。时医以温为阳邪,宜寒宜凉,于是清法大行于时,医有终其身不用仲景法者。但用过清凉,流弊不少。祝氏 1927 年来到沪上,先是息影沪上一年,考察沪医处方用药之习惯。看到沪医之用药崇尚温热学说,善用寒凉,以致不仅温热时病,内科诸病也多用寒凉之法为主。初起辛凉,继则辛寒,至于苦寒、甘寒、咸寒滋腻,但寒凉过剂,机体阳气受戕,病势渐深,多至重危虚脱。何时希曾说:当时沪上时医治疗儿科病,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而崇用寒凉。并且形成一不成文的规律:投凉见害迟,投温见害速;投凉之灾在日后,投温之灾在日前<sup>[4]</sup>。祝氏目睹其流弊,遂另辟蹊径,以大剂姜附温热之剂挽救了很多因投凉太过而气阳衰微的小儿。给沪上医界注入一剂强心针,带来了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。这是祝氏对沪上医家用过寒凉教条主义的反动,对他重阳、温阳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虽然当时“祝附子”在上海医界的处

境是很艰难的,但事实胜于雄辩,卓越的临床疗效让一部分沪上医家翕然而从,由善用寒凉之药转变成善用麻、附等温热剂,形成了一个重视阳气、善用温热的“祝氏学派”。

### 4 因地、因人制宜,主张温热疗疾

温病学派认为,江南地区地卑湿重,而多湿热。为病也自然是温热、湿热者众,故而崇用清凉。叶氏虽然承认“吴人阳微之体”,而有“清凉到六七分,即不可过于寒凉,恐成功反弃也”之训,但仍主张用寒用凉。祝氏则认为,江南地卑湿重,气升阳浮,江南之人滨海而处,发育早熟,智识早开<sup>[1]</sup>。故用脑多者,脑神经先衰;劳肾多者,内分泌先竭。神经衰弱者,不耐高热,易罹谵妄;真精亏者,虚阳不潜,易于上逆<sup>[1]</sup>。所以不管是对稚阳之体的小儿还是成人,体质如此,为病无论寒热,治病时都应当注意固护阳气。他说:“吾非嫉凉,亦非崇温,求真而已。”<sup>[1]</sup>可知祝氏之用温热,确有依据,并非先有成见在胸,每剂必用附子。而是因病证而施,因人因地制宜。这才是祝氏重阳、温阳思想的形成关键因素了。

祝氏重阳、温阳思想在上海真是独树一帜,名闻遐迩。其始出也,曾遭到众多医家的攻讦,大有一傅众咻之势。但卓越的临床疗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最终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祝氏学派。祝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其重阳、温阳思想的形成是沪上医界学术争鸣的产物,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必然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祝味菊,陈苏生. 伤寒质难[M]. 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5. 64, 79 ~ 84
- [2] 何时希. 近代医林轶事[M]. 上海: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, 1997. 221 ~ 222
- [3] 卢崇汉. 扶阳讲记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6. 28, 179, 180
- [4] 清·王孟英. 温热经纬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6. 78 ~ 79

(收稿日期:2007-03-05)

## 专题征稿

《江西中医药》为中医药核心期刊,新设重点栏目《专题谈荟》,以专病列专题,论述该病的病因病机、诊疗方案及临床经验,要求观点、方法新,经验独到。专题有:小儿麻痹后遗症、红斑狼疮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慢性肾炎、哮喘、糖尿病、老年痴呆、高血压、中风、盆腔炎、萎缩性胃炎、癌症疼痛。欢迎广大中西医临床工作者不吝赐稿。